

校園心理健康的一個臨界點—— 大學掙扎著應對層出不窮的學生自殺案件（上）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這個春季學期，在第3個大學生在1學年內自殺的消息傳來後，就讀於長春藤名校達特茅斯學院的瑪莎·阿格蕊（Martha Aguirre）開始注意到大學發出的哀弔電郵有種模式。它們似乎照著一個模板：

「姓名、過世日期、第幾屆、大學專科、成就。」

正要升大四的阿格蕊（Aguirre）為了學校在解決校園自殺事件方面無所作為而感到沮喪，她覺得這些電子郵件的形式是冷酷無情的。

「大伙們，你們到底在說甚麼？人們實際上是在自殺啊。」她對著這些電子郵件說道。

達特茅斯（Dartmouth）的一連串死亡事件使得像阿格蕊（Aguirre）這樣的學生開始尋找答案，並重新引發了有關高等教育中心理健康的討論。在過去的一年裡，其他的學校也一直在努力應對類似的悲劇：西維吉尼亞大學（West Virginia University）有兩名學生自殺身亡，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有五名學生意外死亡。

連續自殺事件—小區域內多人死亡—提升了人們對校園“自殺傳染”的擔憂。研究表明，接觸自殺會增加其他人的自殺行為，尤其是那些已經有自殺傾向的人。

「它可能發生在像達特茅斯（Dartmouth）這樣的小地方或像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這樣的大地方。」高等教育學生事務組織Naspa的會長凱文·克魯格（Kevin Kruger）說道。「當發生一系列這樣的死亡事件時，事實上是更加悲慘的，因為這些事件深刻地影響了當地社區。每個機構都應該研究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我們知道心理健康問題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專家表示，大學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改進自殺預防和應對方案，以幫助阻止悲劇循環。

「我們必須考慮全面的預防措施—為學生提供必要的技能和工具，以應對生活中的一些起起落落。」克魯格（Kruger）說。

2020 年 11 月 19 日，來自南達科他州的 18 歲大一新生寶·杜布瑞（Beau DuBray）自殺身亡，在擁有 6,500 名學生的達特茅斯校區掀起了漣漪。

阿格蕊說，杜布瑞的死是她周邊的朋友們第一次開始討論起心理健康。

「當你看到 50 人坐在圖書館裡時，你會認為這些人全都在認真做自己的事。然後你坐下來，可是你卻似乎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想到自己已經落後大家了。」她說。「我想，當寶（Beau）的自殺被報導出來後，我就意識到很多人都在偽裝。」

然後，在 2021 年 3 月另一名達特茅斯大一新生無預警地死去。來自維吉尼亞州的 19 歲少年康納·蒂芬尼（Connor Tiffany）的朋友告訴波士頓環球報，他的死亡也是自殺。

很快又發生了兩起死亡事件。4 月，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的 20 歲大三學生拉米思·卡里姆（Lamees Kareem）死於與 Covid-19 無關的疾病。5 月，來自紐約的 18 歲大一新生伊莉莎白·雷默（Elizabeth Reimer）在一次自殺未遂住院治療後，學校違背她的意願將她送回家後自殺身亡。

阿格蕊說，雷默的死是學生團體的“臨界點”，他們以臨時守夜和在大學校長家外牆塗鴉等行動為這個學年畫下句點。

針對自殺事件，達特茅斯官方放寬了對新冠病毒的集會限制，允許學生聚集；為衛生服務增加了新的顧問、健康協調員和其他工作人員；組織守夜活動；延長學生申請將課程標記為未完成或者不紀錄的截止日期；並與非營利性 Jed 基金會合作制定支持校園心理健康的計劃和政策。

但是阿格蕊和其他學生希望學校給他們一天假來一起悼念。達特茅斯學生會要求在守夜當天放假一天的要求被校方拒絕，這讓學生們感到沮喪。

達特茅斯學院的通訊辦公室拒絕了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對學校官方的採訪請求。

雖然達特茅斯行政部門對自殺事件的回應符合心理健康專家的建議，但學生們所要求的休息時間也是如此。在允許學生們獲得撫平悲傷的時間和幫助他們繼續前進之間取得平衡可能很困難。

撰稿人/譯稿人：Kate Hidalgo Bellows/翁而真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1.7.15A 'Breaking Point' in Campus Mental Health: Colleges struggle to respond to clusters of suicid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e-need-to-address-the-entire-system>

